

蔡峥：《大学》让更多人理解了我的初心

本刊记者 朱芙蓉

清影的拍摄是有原则性的，不会说缺一个素材，就让我去干一个事儿。
——蔡峥

在清华，很多人是通过《大学》这部纪录电影认识蔡峥的。他买了一张单程机票，举家回国，加入清华大学天文系。

电影里，蔡峥叹气、摇头，说：“做一件事太难了。”但他会接着说：“还是要有人做。”

记者 您最初接受记录电影《大学》的邀请是什么样的情景？您立即同意了么？

蔡峥 2018年我已经确定要来清华工作，但还没完全回来。当时正好回来参加某人才计划答辩，我正在练习答辩的时候，收

蔡 峥



清华大学天文系长聘副教授、系主任。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学士学位，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获博士学位。2015年7月至2019年6月工作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电影纪录片《大学》四位主要人物之一。



到了剧组的 E-mail，说要拍我一段我在国外、一段在国内经历。E-mail 里说他们拍过几部特别好的纪录片，列了名字，刚好我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也是他们拍的，就比较自然地约了见面。同导演王静、孙虹聊了之后，我觉得内容非常靠谱，拍的是咱们大学里头的内容，校领导也都支

持，而且她俩都是很优秀、很靠谱的校友，我就同意拍了。

记者 在拍摄过程当中，您是如何接纳生活和工作中有摄影机和摄影师存在的？拍摄过程对您和家人会造成一定困扰吗？您的项目合作伙伴是如何接纳的？

蔡峥 习惯有个摄像机在旁边，

实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电影最开始也没确定一定选我作为主要人物，同时也在拍别人，因为导演需要跟拍一段时间，去评估这一段时间的镜头，再来确定人选，所以确定我之前，已经跟拍了一段时间。



《大学》剧照

现场拍摄一般会有三个人，还挺兴师动众的。我慢慢适应了，觉得也挺有意思。反而系里的人不太习惯，因为在我办公室里老有摄像机，他们就不太想往办公室进，要说事情的时候，我就出去跟他们说。

家里的适应还凑合，我记得从美国搬家那次，导演和摄影师其实挺挡着搬东西的，我老婆当时不是特开心。可能是因为我只顾着跟他们说话，耽误了搬家。

拍国外的人也还好，比如亚利桑那大学，他们是我们的“乙方”，觉得“甲方”来记录一下也很正常。我们告知他们可能会出现在电影里，有关他们的片段后来也都给他们看了，同意之后再用镜头。

但是，我也有不适应的时候。比如我去观测回来已经很累了，在床上躺着，他们要拍，起来刷个牙也要拍。素材拍得很多，关于我的部分差不多就有1000个小时。

记者 拍摄结束后，您第一次看成片是什么时候？当时感受如何？是否提出相关建议？

蔡铮 导演应该是拿到“龙标”（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后才给我看的。第一次看片是2021年春天，电影夏天上映。孙虹把我叫到清影工作室看片，看了两次。



蔡铮（左1）在《大学》首映礼上现场弹唱，从右往左：导演柯永权、孙虹、王静

第一次看，我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觉得我那段太短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觉得本科那部分有点拖沓。他们后来把每个人的时长都单独截出来，我的时长还是第二多的。

很多人看后都反映我那段比较精彩，一会儿做项目，一会见校长；景的切换也好，加州、夏威夷、上山、星空。可能不一样年龄的人，关心的事情不一样吧，我的年龄的人自然就很关心工作有关的事。

记者 您如何看待清影工作室正在做的纪录片工作？片中跟校长谈话的这一场是专门设计的吗？

蔡铮 清影的拍摄是有原则性的，不会说缺一个素材，就让我去干一个事儿。《大学》里没有刻意安排的事儿。电影里的情节，

包括到工字厅跟校长谈话，完全不是电影刻意安排的。他是我的入党联络人。这么多年，我的入党发展会、转正会、每半年一次的谈话都是他亲自跟我谈。

电影在放映前有保密的要求。拍摄电影的时候，他不知道我是电影的一个人物，我也不知道他当时也在被拍摄，当然我相信电影肯定会拍他。

我认为清影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导演孙虹和王静，包括摄影师，他们就默默地记录，默默地剪辑，把最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不会说为了缺一个镜头，就去表演一个镜头。

我觉得他们在做一件积德的事情，他们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为了抓住闪光点，为了拍到那一点点 signal（信号），要拍很长时间来等待。纪录电影应该说是

小众的，并不是太为别人所看见的，艺术的成分很高，需要静静地做，假如他们拍一些别的片子，早都不知道火成什么样、挣多少钱了，但是他们一直选择这样的事业，我觉得非常值得尊敬，所以他们跟我提的要求我都会满足。

记者 电影上映后，您的同事、朋友是否更了解您了，他们有什么反馈吗？

蔡铮 电影上映前，我在清华工作已经两年了，也有不少人认识我。但是2021年7月电影上映后，我享受了一把当“顶流”的感觉。那段时间，大概有一两个月，我每天走在学校路上都会有人跟我打招呼，有的时候那人都骑车走了好远，还回头盯着我看，可能因为他觉得我是《大学》里的蔡峥，但也不太敢认。离开清华，走在大街上，还有人能认出我。有一次我到奥体踢球，踢着踢着，有人就过来问：你是不是蔡老师？

电影上映后的两个月，我经常去电影院做映后交流。电影没放完，我就找个凳子在外边坐着，打开电脑工作。遇到别的影厅散场，还会有人过来围着跟我聊。

记者 从拍摄到上映，《大学》对您本人，对您的事业发展有什么影响？比如是否促进了您研



2021年7月15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与深圳市清华大学校友会联合举办纪录电影《大学》观影活动

究的下一代6.5米宽视场光谱巡天望远镜（MUST）的建设？

蔡铮 那时候望远镜项目还是很难做的，就算去映后交流，我还是想着自己望远镜的事情，想着科研中间遇到的问题。拍电影多少有被打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段人生的经历。我对自己了解得非常清楚，没有觉得心里有任何变化，还是focus（聚焦）在我的主业上。

我那时在给望远镜项目筹款，得抓住每一个机会，去宣讲望远镜的事情，所以我把映后交流当成一种工作。从办公室出发去放映厅，我都抱着吉他走，因为每次他们都让我弹唱《大学》里的歌，说大家都想听。

电影上映以后，我觉得首先学校认为望远镜项目是靠谱的，看到了我的初心和努力。其实在

学校也有讲项目的机会，但是领导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了解一个项目到底是怎么诞生的，看了片子能产生共情。因为《大学》，现在到我到各个部处去，还能听到他们说，我们这几年都是看着你成长的，你的想法我们都很清楚。这些都是《大学》带给我的，我很感恩《大学》。

MUST项目在清华的知名度很高，上上下下都很关心。外部的帮助是陆陆续续的，因为大家没有去影院看《大学》，线上又看不了。后来，电影在线上能看了，就会有人第一时间提醒我申请某个项目经费，其实学校也会发通知，但是有人愿意在部委官网消息刚发布就来告诉我，让我心理上对项目有了更多信心，也说明他们对我有信心。🍷